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ina Nina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阿彭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olina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阿彭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阿彭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404—5

I. ①安… II. ①托…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27 号

安娜·卡列尼娜

著 者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

译 者 阿 彭

责任编辑 曹 静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04—5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导 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改革家、道德思想家,他生于莫斯科以南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16岁时他进喀山大学,18岁时他放弃大学学习,回家致力于改善农民生活。但因他身为地主,想要改善农民生活则困难重重。1851年,他毅然投军,去高加索作战。1854年发表处女作《童年》。1854年他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后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叙述了他的这段经历。1857年及1860~1861年,他两次游历西欧。在婚后15年中,他创作了两部最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1880年以后,他毅然放弃贵族立场,世界观发生了彻底转变。这一阶段中除《复活》之外他还写出了《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作品,强烈控诉了黑暗社会,也表现出他思想深处有着严肃的探索和深刻的矛盾。正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为复杂的一个”。

《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围绕着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联的线索展开:一条是安娜和她的丈夫卡列宁、情人弗隆斯基之间的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和他的恋人吉蒂之间的故事。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充满生命活力的贵妇人。她16岁时由姑妈做主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十岁的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沙俄政府官僚卡列宁,并与他维持了八年平静而无聊的婚姻生活。一个偶然的时机她遇见了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弗隆斯基,坠入情网,无法自拔。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唾弃。卡列宁为了不影响自己仕途发达,也为了惩罚安娜,不准她同儿子见面,无情地剥夺了她作为母亲的基本权利。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弗隆斯基产生了动摇,渐渐将安娜的爱情视为束缚。他的感情开始冷淡下来,安娜觉察到了这点。她感到在生活中的最后一个依靠失去了,于是她的精神彻底地走向了崩溃。她决心以自杀来解脱自己,来惩罚自己爱恋的“负心人”,向贵族社会发出最后的一次抗议。



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围绕列文展开的。他是一个拥有三千亩土地的年轻的大贵族庄园主。他强壮、热情、忠厚，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热衷于思考各种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他在自己的庄园里从事改革，企图通过不流血的变革，协调他与农民的利益，但此路不通，改革失败，他曾一度陷入了悲观的境地，濒于自杀的边缘。最后，他在具有浓厚的宗教法制思想的贤妻吉蒂的影响下，皈依了宗教，并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启迪和感召下顿悟了“为上帝，为灵魂活着”的人生真谛，与安娜悲惨的绝境正相反，列文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与寄托。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整体建立在一种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对比中。在人物关系上，安娜和吉蒂对比，列文和弗隆斯基对比，弗隆斯基和卡列宁对比，列文、科兹内舍夫和尼古拉对比，弗隆斯基又和亚什文以及那位外国王子对比，安娜又和朵丽对比，吉蒂又和瓦莲卡对比……在情节发展上，安娜和弗隆斯基的这一条线索不断地与列文和吉蒂的另一条线索交替出现，相互对比。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每一个人物都能够随时在一面镜子中见到自己，读者也可以更为突出鲜明地见到生活的实质和每一个人物里里外外的特征。

托尔斯泰为《安娜·卡列尼娜》所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主题”，他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一种女人应该只在家庭中做贤妻良母的观点，但是安娜的遭遇却实际上大大超越了这个主题，而是一个俄国（以及全人类）在由封建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代的主题，社会的主题，妇女解放的主题，或者说是人性解放的主题。

安娜是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中最丰满、深刻和高大的人物，比《战争与和平》中的纳塔莎开阔，比《复活》中的卡秋莎深邃，她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现丈夫与家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于是宣布她不能与他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不仅是夫妻双方，一家老少，所有家庭成员都为此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已毫无意义，就连每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们的关系也要比他们一家人融洽。妻子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丈夫则整天在外不回家，孩子们不安地在房间里乱窜。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架，还给女友写信，请女友为她找个新差事；厨师昨天正当开午饭的时候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都要求辞工算账。

与妻子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隆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斯季瓦）和往常一样早晨八点钟醒来，却不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在弹簧沙发上翻了个身，好像还想睡一大觉，他紧紧搂住枕头，将脸贴在上面，但他突然坐了起来，睁开双眼。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想，一边回想着梦境。“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对！阿拉宾在达姆斯塔特举行晚宴，不，不是在达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它们原来都是女人。”他的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彩，他微笑地沉思着。“是的，太好了，太妙了，有趣的事还多着呢，只是难以言表。”这时，他发现一缕阳光透过呢绒窗帘侧面的缝隙射进



屋来，他开心地把脚从沙发上伸下去，搜寻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还明白他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真糟糕！”想到家里发生的一切，他叹起气来。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同妻子吵架的所有细节，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最苦恼的自身的过错。

“不，她不会原谅我——她不可能原谅我！而且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自己的过错。这却也不能怪我，这就是全部的悲剧所在，”他想到，“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会儿，他刚从剧院回来，幸福而又满足，手里拿着个准备送给妻子的大梨。结果，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使他吃惊的是，她也不在书房里。最后，他在她的卧室里找到了她，她手里正握着那封令人沮丧，将一切都披露无遗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被他认作头脑简单的女人多莉，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懊恼的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那时他的面孔上全然不由自主地（“大脑反射”，奥布隆斯基心想，他是爱好生理学的），忽然全然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惯常的、好心的，也是愚蠢的微笑来。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这种傻笑，因为多莉看见他脸上的傻笑，好像身体被刺了一下似的，哆嗦了一下，她立刻火冒三丈，说了一大串激烈的话，跑出房间去了。从此以后，她就不愿再看到他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隆斯基想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对自己说，却找不到答案。

二

奥布隆斯基是一个对自己很诚实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硬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一个三十四岁的、英俊多情的男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不爱这个只比他年轻一岁的、五个活着的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对此他现在并不感到后悔。他只后悔自己没能更好地瞒过妻子。然而他感受到了自己处境的全部分量，并且也为妻子、孩子和自己感到难过。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会竭力把这罪孽瞒住，不让她知道。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早已知道他对她不忠实，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他甚至认为，她已经年老色衰，失去风姿，毫无魅力，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理应对他宽宏大量，不计较什么。谁知正好相反。

“糟透了！唉，唉！真是糟透了！”奥布隆斯基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却一筹莫展，“在出这件事之前，一切都是那么顺心，我们生活得多么美满！她因为有了孩子而感到称心如意，十分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侍弄孩子、料理家务。老实说，糟就糟在罗兰从前是我们家的家庭女教师。真糟糕！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的确有点儿庸俗，下流。然而她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家庭女教师啊！（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狡黠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放肆过。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真想不到，这一切好像是故意刁难我的！唉，唉！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呢？”

没有答案，只有生活所给予的那些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的通常的答复，那就是，一天天过下去吧。换句话说，忘却吧。但是，既然他已经不可能在睡梦中忘却，至少不到夜里便不可能，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些小小的长颈瓶女人的音乐世界中去，他就非得使自己沉溺于生活的梦境，来寻求忘却了。

“走着瞧吧。”奥布隆斯基对自己说。然后他站起身来，穿上深蓝色绸衬里的灰色晨衣，甩过腰带穗子打了一个结，给自己宽阔的胸腔里满满地吸进一口气，两只向外撇开的脚，那么轻盈地托住他丰满的躯体，迈开他习惯了的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向窗前，拉开窗帘，使劲地摇了摇铃。随着铃声，走进来一位老朋友，他的贴身仆人马特维，手里捧着衣服、皮靴和一封电报，

跟着马特维又进来一个捧着理发用具的理发师。

“衙门里有公文送来吗？”奥布隆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问道。

“在桌子上。”马特维回答说。他用一种同情和疑问的目光看了看老爷，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补充说，“马车店的老板派人来过。”

奥布隆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奥布隆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何必说这话呢？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马特维双手插在上装口袋里，伸出一只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地看了一眼。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他白跑。”他说出了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话。

奥布隆斯基明白，马特维是想说说笑话，让人注意他。奥布隆斯基拆开电报，一面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字，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就要来了。”他做了个手势，让理发师那只油亮光润的胖手停一下，说道。理发师正在他那长长的鬃曲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

“感谢上帝。”马特维这样答道，以此表示他像老爷一样懂得她，也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她是奥布隆斯基心爱的妹妹，她能促成这对夫妻言归于好。

“是她一个人来，还是他们夫妇同来？”马特维问道。

这时理发师正在刮奥布隆斯基的上嘴唇，他不能张口说话，就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那就让她住在楼上？”

“告诉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由她吩咐。”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马特维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没错，喏，把电报拿给她，看她怎么说。”

“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马特维心里明白，但嘴上却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那双走路时咔咔作响的长靴慢慢腾腾地回到房里的时候，奥布隆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让我向您禀报，说她要走了，‘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随您的便，老爷”。他眼睛中露着笑意说道。然后他



把两手插在衣袋里，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瞅着老爷。奥布隆斯基没有做声。随后他那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和善的、带点苦涩的笑。

“呃？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解决的。”

“会解决吗？”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奥布隆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悦耳的声音。接着老保姆玛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严厉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

“玛特廖娜，有什么事？”奥布隆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他和妻子的事全是他的错，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可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这个老保姆，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心腹——也都站在他这一边。

“有什么事？”他灰心丧气地说。

“您去一下，老爷，再去认个错，可能会起作用的。她太痛苦了，太可怜了。这弄得家都不像个家了。老爷，也该可怜可怜孩子们，去认个错吧！怎么办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可是她不愿意理睬我，不愿意听我……”

“该您做的您尽量去做——上帝是宽厚的。您要祷告上帝，求上帝保佑！”

“嗯，好的——您去吧。”奥布隆斯基说，他忽然脸红了。

“我来穿衣服吧。”他对马特维说，下了决心似的把晨衣一下子甩掉。

马特维已经像拿着马套子一样把洗净熨平的衬衫提在手里，正在吹去上面的一点看不见是什么的东西，以一种显然的得意神情把衬衫套在老爷那精心保养的躯体上。

三

奥布隆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拉齐衬衫袖口，照例把香、皮夹子、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浑身芳香，精神抖擞。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给他准备好咖

啡，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他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上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出卖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他就觉得是受了侮辱。奥布隆斯基看完信，把公文挪到面前，很快地翻阅了两个案卷，他用粗铅笔做了一些记号，然后把案卷推开，喝起了咖啡。

与此同时，他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起来。奥布隆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派的报纸——不是极端派，而是那种大多数人所支持的派别。他虽然对科学、艺术、政治都并不特别感兴趣，他却也对这一切问题牢牢地持有着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所持有的观点，并且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才作改变，或者，不如说，不是他变，而是这些观点不知不觉间在他心中自己改变了。

奥布隆斯基既没有选择哪一个派别，也没有选择哪一种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己找上门来，就像他并没有选择帽子或礼服的式样一样，人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就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必然会有思想活动，而思想到了人生的成熟期又会发展，所以他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就像必须有一顶帽子一样。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像他圈儿里的多数人那样选择保守派，而是选择了自由派，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合乎情理，而是因为自由派比较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隆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隆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做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钳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隆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儿谈论来世。此外，奥布隆斯基爱开玩笑，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你要是夸耀门第，就不该仅限于提到留里克，而丢开你最初的始祖——猴子。

于是奥布隆斯基便养成了自由派的习惯，他喜欢这份报纸，就像他喜欢饭后一支烟一样，因为这份报纸能使他的脑袋里涌起一阵轻薄的迷雾。

他看了社论，其中谈到，当今毫无必要大喊大叫，似乎激进派正威胁要吞没一切保守分子，似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的隐患。相反的是，“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假想的革命隐患，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传统”，等等。他又读了另一篇文章，关于财政的，其中提到边沁和穆勒把政府的一个部刺了一下。他凭着敏捷的头脑，能分析出任何嘲讽的含义，即这种嘲讽的发难者是谁，嘲讽针对的是谁，起因是什么。这种分析往往会给他带来某种乐趣。但是今天，这种满足由于他想起了玛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给他的忠告，想起了家里的这一堆麻烦而遂遭到破坏。他继续去看那篇关于贝斯特伯爵已赴威斯巴登的报道，以及关于根治白发、轻便马车出售、某年轻人找工作等广告，但这些栏目今天却不能像往常一样带给他一种宁静、讥讽的快感。

看过报纸，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奶油面包，他站起身来，拂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接着挺着宽厚的胸脯开心地微微一笑。这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而纯粹是由胃口甚佳引起的。可是，这开心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因而他又陷入了沉思。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隆斯基听出是他的大女儿塔尼雅和小儿子格里沙的声音）。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在地上。

“我说嘛，车顶上不能乘客人，”女儿用英语叫道，“捡起来！”

“怎么能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呢，”奥布隆斯基想，“真是乱七八糟。”他走到门口召唤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匣子，向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气味儿。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而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自己意识到他不像喜爱大女儿一样喜爱他的小儿子，但他尽力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小男孩感觉到了这点，对他父亲冷淡的微笑无动于衷。

“妈妈？她已起床了。”小女孩答道。

奥布隆斯基叹了一口气。

“这么说她又一夜未眠。”他想到。

“怎么样，她高兴吗？”他补充道。

女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母亲心里不会高兴。这一点父亲应该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显然是装出来的。所以她为父亲脸红，父亲也立刻觉察出来了，脸也红了。

“不知道。”女儿说，“她不让我们上课了，让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奶奶家去玩儿。”

“那就去吧，我的小塔尼雅。啊，对了，等一等！”他说着仍然拉着她，抚摸着她那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架上拿下一小盒糖，是他昨天放在那儿的，给了她两块，拣她喜欢的，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姑娘说，指着那块巧克力。

“对，对。”他又再次抚摩了她小小的肩头，吻了吻她的发根和头颈，才放开她。

“马车已备好了，”马特维说，“有位女人等着见您。”他又补充道。

“她等了很久吗？”奥布隆斯基问道。

“大约半小时。”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只要有人来，就立即告诉我吗？”

“我至少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用粗声、友好的口气说，让人没法生气。

“那你就快点儿让她进来吧。”奥布隆斯基懊恼地皱着眉头说。

来请愿的是上尉参谋卡里宁的妻子。她提出了一个根本办不到的无理要求，但是奥布隆斯基照例还是请她坐下，仔细听她把话说完，中间没有打断她一句，还详详细细地给她出了个主意，告诉她该去找谁和怎么个找法，甚至还用他那粗犷、奔放、漂亮而清晰的字体，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可能帮她忙的人。把上尉参谋的妻子打发走之后，奥布隆斯基拿起帽子又站住了，想想有没有忘记什么。看来，除去他想要忘记的，即他的妻子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哎，是呀！”他垂下头，那张俊秀的面孔上浮现出凄苦的表情。

“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着，但内心却在说，不用去，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他们的关系已无法补救，因为她不能再变得年轻美丽，富有魅力，而他也不能立刻成为对女人无动于衷的老人。现在除了虚情假意、说谎骗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虚情假意、说谎骗人却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但早晚还是得去，总不能一直这样僵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两口，就把它丢在螺钿烟灰缸里，迈着大步穿过阴暗的客厅，打开另一扇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四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穿着小褂，当年那一头浓密的秀发如今已经稀疏，扎成辫子盘在脑后，一张脸瘦得瘪了下去，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显得格外大，格外突出。她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满屋子都是。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望着门口，竭力要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和轻蔑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她怕他，也害怕此刻和他见面。她刚刚试着做过这三天来试了上百次的事：把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挑出来，带到娘家去，可她就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然而就是现在，也像上几次一样，她仍然对自己说，不能这么拖下去，——她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惩罚他，让他丢丢面子，他给她带来那么多痛苦，她要报复一下，哪怕报复一小点儿也好。她仍在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是又感觉到，这是办不到的事。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她无法不把他看做自己的丈夫，她爱他，这已养成习惯，无法改变。此外，她还感到，若是在这里，自己家里，她还照管不过来这五个孩子，那么带他们去别处，他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这三天来，最小的一个孩子由于喂他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生了病，其余几个昨天几乎没有吃上午饭。她感到，走开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她仍在欺骗自己，仍在不停地收拾东西，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

她一看到丈夫，就把手伸进橱柜的抽屉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当丈夫一直走到她跟前，她才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她本想板起一副严厉的、果断的面孔，可是却流露出一种失落的、痛苦的表情。

“多莉！”他怯生生地低声说。他缩着头，竭力装出一副顺从和可怜的模样，但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神态。“哼，他倒是春风得意啊！”她想，“可我呢……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可大家还因此而喜欢他，称赞他呢。我就恨他这副样子。”她抿紧嘴唇，那张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颊的肌肉抽搐了起来。



“您有什么事？”她急急地说，话音低沉，不像是她的声音。

“多莉！”他声音发颤地再叫一声，“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大声嚷着。

“但你必须要接待，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喊叫起来，看也不看他，好像那喊叫是由于肉体的疼痛而发出的。

奥布隆斯基在想到他妻子时还能镇静，还能希望事态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自行好起来”，还能平静地读报纸、喝咖啡。但是当他此时看到他妻子那憔悴、痛苦的面容，听到她那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他连气都喘不过来，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眼泪涌入眼眶。

“天哪，我做的是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吧！……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喉咙被泪水哽住了。

她把衣柜关上，看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请你原谅，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补偿一时，一时……”

她垂下眼睛，听着，等着听他说什么，似乎是在恳求他说点什么，好让她不相信那事儿是真的。

“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可是一听到这句话，她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抿紧嘴唇，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走开！”她声音更尖锐地嚷道，“别来对我说您那种冲动和卑鄙的行为！”

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她连忙抓住椅背。他的脸变宽了，嘴唇撅起，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多莉！”他说着呜咽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是无辜的，是我有罪，你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赎罪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有罪，我确实罪孽深重！可是多莉，你就宽恕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大声喘息，他说不出有多么怜悯她。她几次想开口，可是口难开。他等待着。

“你想起我们的孩子，就是跟他们玩儿，而我一想到孩子们，就觉得他们现在被毁了。”她说道，显然这后一句话是她这三天来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的一句话。

她对他说“我们的孩子”，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就移近些，想去拉她的

手，可是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躲开了。

“我想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挽救孩子们，人世间什么事我都可以干。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孩子们：我是带他们离开父亲呢，还是把他们丢给放荡的父亲……是的，就是放荡的父亲……哼，您说说看，您干出那种……那种事儿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过下去吗？这可能吗？您说说看，这可能吗？”她提高嗓门儿，又说了两遍，“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的教师私通之后呀……”

“可是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一边把头愈垂愈低。

“我嫌您讨厌、恶心！”她嚷了起来，愈嚷愈凶，“您的眼泪——不过是几滴水罢了！您从来没爱过我，您既没有人心，也不知羞耻！您让我觉着卑鄙、讨厌、陌生，对，您完全是个陌生人！”她痛苦地也是恶狠狠地说出“陌生人”这个对她自己来说非常可怕的字眼。

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起来，大概是跌倒了。多莉留神倾听着，她的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显然是定了定神，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霍地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可是她还爱着我的孩子呀，”他察觉到听见孩子喊叫声时她面容上的变化，“我的孩子，那她又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还有一句话。”他跟着她，说道。

“您要是跟着我，我就叫人，叫孩子们！让人人都知道，您是怎样一个流氓！我这就走开，您跟您的姘头在这儿住去吧！”

奥布隆斯基叹了口气，擦了擦脸，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马特维说事态会自行好起来的，——怎么才能啊！我看一点可能都没有。天哪！多可怕啊！她那些叫喊多么粗俗，”他自言自语道，回想着她刚才的尖叫和所用的“流氓”“姘头”等粗俗字眼，“也许女仆们都听到了，多么粗俗，太粗俗了！”他静站了片刻，擦擦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走出了房间。

这一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布隆斯基想起，他曾和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一次玩笑，说他这个德国人“为了给

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了发条”。想到这个，他笑了。奥布隆斯基喜欢善意的玩笑。“说不定事情真的自会解决的！自会解决——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和玛丽娅一起把休息室收拾收拾，让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住吧。”他对进来的马特维说。

“遵命，老爷。”

奥布隆斯基穿上皮大衣，出了房间，来到大门口。

“您回来吃晚饭吗？老爷？”马特维边送他，边说。

“看情况。喏——拿去操持家务用吧，”他说，从皮夹中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马特维，“够了吗？”

“够不够就这么多吧！”马特维一边说，一边把车门关上，退回到台阶上。

这时，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已经哄好了孩子，她听到马车的声音，知道他走了，她又回到卧室。这是她躲避烦琐家务事的唯一的地方，只要她一走出这个房间，家务事就缠住了她。就是刚才，当她走进育儿室这短短的工夫，英国家庭女教师玛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就问了几个不能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解决的问题：孩子们出去玩儿穿什么衣服，给不给他们喝牛奶，是不是派人去另找一名厨师？

“哎，别来烦我，别来烦我！”她说完，便回到卧室，在她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来，紧握着瘦得连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到尾重温那场谈话。

“他走了。但他和她的事到底怎样了结呢？”她想，“莫非他和她还在幽会？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凑凑合合是不行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又一次重复了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她觉得十分可怕的词儿，“天晓得，我本来多么爱他呀……多么爱他呀！难道现在我不爱他了？我现在不是比从前更爱他吗？最可怕的，也是最主要的是……”刚想到这里，玛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从门口探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要不要派人去叫我兄弟来？”她说，“他好歹会烧个饭，要不，还像昨天，到六点钟孩子们也没吃上饭。”

“好的，我这就出去吩咐。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没有？”于是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又忙起日常家务来了，把她自己的悲伤暂时淹没在繁忙中。